

March 2015

On Wang Youpu's Criticism on the Ancient-Style Prose and Its Value

Zukun Y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u, Zukun. 2015. "On Wang Youpu's Criticism on the Ancient-Style Prose and Its Valu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2): pp.41-4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2/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及其价值

余祖坤

摘要: 古文批评是桐城派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理解其古文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方苞的弟子王又朴就是一位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古文批评家。他以方苞的义法说作为其古文批评的理论基础,紧紧抓住义和法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透过人们习焉不察的文字和细节,发现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深隐之意。王又朴在贯彻义法说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借鉴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眼光和经验。这不仅使他对文法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分析能力,善于揣摩所评书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作者隐含在笔墨之中的幽微心理,而且使他的批评文字充满激情,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文学色彩。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揭示了《孟子》和《史记》的很多义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此二书的理解;其批评方法和批评特色,对当代学者的古文研究乃至文学批评方式的改进,都有丰富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王又朴; 桐城派; 古文批评; 学术价值; 方法论意义

作者简介: 余祖坤,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散文及其理论研究。电子邮箱: yzkyzk@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文法概念范畴研究”[项目编号: 13CZW02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Wang Youpu's Criticism on the Ancient-Style Prose and Its Value

Abstract: Critical practice on the ancient-style pro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terary activity of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ue resear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prose theory. Wang You-pu (1681-1760) was one key figure in developing the school's prose theory. As a disciple of Fang Bao, the founder of the school, Wang developed Fang's notion of *yifa* (meaning-method) by expand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yi*) and method (*fa*). Wang You-pu had also combined Fang's notion of meaning-method with Jin Shengtan's (1608-61)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 and vision, which not only sharpened his perceptive and analytical capacities concerning the meaning and method and provided better perspectives for him to probe into the author's mentality and psychology but also enabled him to take on extra passion,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exceptional literariness in his critical writing. Wang You-pu's prose criticism revealed much about the meaning-method in the works of Mencius an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could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books. His critical approach and practice are valuable for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classic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Wang Youpu; Tongcheng School; ancient-style prose criticism; academic value; methodological value

Author: Yu Zuk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Chinese ancient prose and its theory. Email: yzkyzk@163.com

桐城派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三个方面: 古文创作、理论建构和古文批评。迄今为止,关于桐城派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的研究,已经产生了比较丰富的成果,而其古文批评,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实际上,在桐城派作家之中,有很多人除了进行古文创作和理论建构之外,同时也积极从事古文批评,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批评著作,如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和《史记评语》、王又朴的《孟子

读法》和《史记七篇读法》、方宗诚的《春秋左传文法读本》、吴汝纶选评的《古文读本》、吴闿生的《左传微》、《孟子文法读本》、《古文范》评点及《桐城吴氏文法教科书》等等。

桐城派的古文批评是其古文理论在批评领域里的具体展开,它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读和评点,直观地体现了其古文理论的丰富内涵。就拿“义法”概念来说,桐城派所说的“义法”其实是一个上位概念,其内涵包括“义”和“法”两个层面,“义”决定“法”,“法”随“义”变,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综合起来看,“义法”是对文章内容安排和行文技法的统称。那么,“义法”究竟是通过哪些具体的技法表现出来的呢?这是方苞提出“义法”概念之后必须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正由于此,方苞选取《左传》和《史记》的部分文章进行评点,通过揭示其具体的笔法,对“义法”概念作出了更直观的解释。比如“连类而书”、“两两相映”、“虚实详略”等等,无疑有助于人们对古文义法形成更直观的认识。因此,为了更进一步地理解和学习桐城派古文理论,必须深入研究桐城派的古文批评。

在桐城派古文批评家之中,方苞的弟子王又朴是一位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具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杰出代表,值得重视。

一、王又朴其人及与方苞的渊源

王又朴是方苞的弟子,是桐城派的一位重要成员,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就曾对他作过简要介绍(9192),但今人很少关注他。^①

王又朴(1681年-1763年),字从先,号介山。原籍仪征,6岁时随父北迁至天津。雍正元年(1723年)中进士,官至庐州同知,后又权知池州、徽州府。王又朴精通经学,工文章,古文尤受知于桐城方苞,著有《易翼述信》十二卷、《大学原本说略读法》二卷、《中庸总说读法》二卷、《诗礼堂古文》五卷、《王介山时文》五卷、《孟子读法》十五卷、《史记七篇读法》二卷等。

王又朴自幼聪颖过人,七岁以后,先后师从文在塘、顾勉旃等人学习“四书”和时文,同时也从事古文创作。雍正元年中进士,座主师朱轼对他十分赏识,并为延誉公卿间,使其名声大噪。雍正二年,清廷平定青海,王又朴作《铙歌鼓吹曲》。

方苞大为赞赏,叹曰“此东南未有才也”,并索其旧作,从此开始向其传授古文之法(王又朴,《诗礼堂》卷上43)。王又朴在《王介山古文·自序》中说“及成进士,见方先生于京邸,持所为古今文者为贽。先生曰‘时艺则得矣,然余久不视此。至古文,当观古之制作者,盖古人非苟焉而作也。有义焉,非于圣贤精理微言有所阐明则不作,非于世道有所维持关系则不作。有法焉,详所当详,略所当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因说《史记》萧、曹二《世家》以为概。余乃稍稍悟,退而出篋中旧稿,尽焚之”(1)。此外,他在《又答龚孝廉书》(《王介山古文》卷四3)、《王介山时文·自序》(卷首1)中一再提到这次经历,可见对方苞的义法说是十分信服的。后来,王又朴对方苞一直执弟子礼,与方苞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常以自己的作品求教。比如他在《书倪节母王孺人行略后》一文中就说“余师方望溪先生退老金陵,余以职事谒上官,至必就先生”(《王介山古文》卷四38)。而方苞对王又朴也十分赏识,经常对其创作进行指导,《诗礼堂古文》中的很多文章之后附有方苞的评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方苞的精心指导之下,王又朴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乾隆十二年,王又朴以所作古文及《项羽本纪读法》呈教。方苞回信评价道“致来诸古文辞并《项羽本纪读法》,颇识高笔健,义法直追古人,而《项纪》一通,尤发前人未发,贤之用心勤矣”(“方望溪”50)。总之,自从王又朴与方苞相识之后,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师生之谊,交往频繁;方苞的义法说使王又朴对古文创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对他的创作和批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方苞向王又朴讲《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曹相国世家》的义法,则为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示范。

在方苞的启发之下,王又朴也对《史记》进行了深入探索。其《史记七篇读法》对《项羽本纪》、《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和《魏其武安侯列传》这七篇传记的义法进行了十分精细的分析,揭示了许多蕴含在文法之中的微言大义,其中绝大多数观点不仅新颖独到,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可以说,王又朴在方苞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了《史记》的义法,从而推动了义法理论

的发展。此外,王又朴还在方苞的基础之上,将义法理论运用到说理文的批评之中;其《孟子读法》不仅对《孟子》各章的文法条分缕析,对其意旨也进行了深入详尽的阐释。方苞讨论义法,主要还是针对《左传》、《史记》、《汉书》、《五代史》等史传文章而言的,而王又朴则把义法理论运用到说理文的批评之中,这是他推动义法说发展的又一贡献。

二、王又朴古文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批评原则

方苞义法说的核心内涵是:义为法的根据,法是义的表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正由于此,方苞认为,古文创作既需本于经术和依于事物之理,同时又要根据义理表达的需要而运用相应的文法(郭绍虞 634-38)。由于方苞的影响,王又朴古文批评的首要特征,就是以义法说作为理论基础,注重通过对文法的细致剖析,揭示文章的微言大义。

在方苞、王又朴之前的古文批评家,对义理和文法各有侧重,鲜有二者兼顾者。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皆重在论文而基本不涉及义理,而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则“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纪昀等 2619)。方苞融会以前道学家和古文家的观点,提出义法说,强调义是法的根据,法是义的表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为文必须因义生法,法随义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义法说的内涵,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和《史记评语》中对《左传》和《史记》的义法进行了独到的阐发。在批评方法上,方苞既善于据义而观法,同时又注重由法而见义,开创了一种新颖独到的批评思路。不过,其《左传义法举要》毕竟只选了《左传》的六节文字,评论也显得比较简约;其《史记评语》乃是片言只语的汇集,不仅规模很小,不成体系,而且没有摆脱一般评点缺乏严密论证的缺点。而王又朴则在方苞的基础上,以义法说作为其古文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不仅扩大了义法批评的规模,而且使其得到了细化和深化。在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中,每节的评论,一般只有两三百字,最长的也

只有千余字。而王又朴的《孟子读法》则对《孟子》全书进行了逐章分析,篇幅长达十五卷。在方苞的《史记评语》中,短的仅有十来字,最长的也只有百余字。而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中的《项羽本纪读法》则有一万三千字,涉及命意、篇法、章法、句法、节奏、声调等各个方面;对一篇传记作如此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他六篇,一般也有一千多字,少的也有近千字。足够的篇幅使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具有了比较严密的论证和相对完整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一般古文批评笼统模糊的缺点。

在王又朴看来,《孟子》、《史记》的很多义理都隐藏在具体的文法之中,所以无论是他的《孟子读法》,还是《史记七篇读法》,都采取了因义而见法、由法而寻义的批评视角。其中,《孟子读法》对《孟子》各章的评论一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其文法的剖析,第二部分则在此基础上,进而对其义理进行疏通和解释。这种独特的体例,使文法的分析与义理的解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比如对“鱼我所欲也”章,王又朴首先指出:“不过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耳,乃必反反复复,详悉发挥,几乎毫无馀蕴者,盖不如是,不足以唤醒世人耳”(“孟子”卷十一 24)。接着他将全章分为八段,并分析了各段的大意及其细密的逻辑关系,说明了“反反复复”的具体所指。这里,他不仅指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全章主旨,而且还说明,作者正是为了唤醒世人,故而采取了“反反复复”的论述形式。由此可见,王又朴对文法的细腻剖析,是以解释义理为指归的,并非徒然斤斤于字句而已。他的分析,不仅指出作者说了什么,而且还指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以及这样说产生了什么效果,甚至有时还指出不如此说则又会是什么效果,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又朴读《史记》,同样也采取了由法以观义的方法。他在《项羽本纪读法题词》中指出:“昔班孟坚讥《史记》重货殖而轻仁义,进游侠而轻道德,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后之学者类多耳食,遂谓史公能文而未知道。[……]史公盖多恢宏谲诡之词,不肯显言正论,又时以他事闲文自掩笔墨之迹,且文辞浩瀚,读之者目眩神骇,往往一篇不能尽,故能得其旨者绝少”(“史记”卷首 1)。有鉴于此,王又朴从分析文法入手,去寻求其背后隐藏的微意,以期证明司马迁并非不知圣人之道,最终消除人们对《史记》的误解,同时也力图向人们

展示一种有效的文本细读方法,这就是整部《史记七篇读法》的根本宗旨所在。

正是由于王又朴紧紧抓住义和法之间的关系,加之他对文法具有非凡的感受力,所以,他能够透过人们习焉不察的文字和细节,发现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深隐之意。比如,《史记·项羽本纪》在记叙项羽之死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氏”(司马迁423)。如果稍不留意,读者很可能将这段文字忽略过去;因为项羽已死,故事的主体已经结束,这段交代似乎无关紧要。然而,这段看似无足轻重的文字,实则大有深意。王又朴指出:

羽之不仁,秦人怨之,天下怨之,即楚之人亦怨之,即羽之诸父昆弟亦莫不怨之。然则羽虽气雄一时,实一独夫而已。文中写一项伯,即接手又写一项庄。项伯者,为汉间羽者也;项庄者,不尽力于羽者也。读至终篇“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封项伯为射阳侯。”又云“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氏。”然则项氏之叛羽者固已多矣。此固史氏深文隐笔,而人不得而知之者也。(“史记”卷一6)

也就是说,在王又朴看来,这段话的用意是在暗示:项羽残暴不仁,大失人心,就连他的同姓族亲都纷纷投靠刘邦、为刘邦所用。如果不是他们投靠了刘邦,刘邦何以封其为侯、甚至还要赐姓刘氏呢?可见项羽大失天下人之心,以致众叛亲离,是导致他人悲剧的根本原因。这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文中很多史事的安排,都是为了暗示此意。正是由于把握了这条主线,王又朴对很多史事都做出了新颖独到的解释。比如他指出:文首写项梁举事处,都是为了说明他善于收拾人心,目的是与项羽不能用人反照(“史记”卷一9)。至于垓下之败,王又朴则又指出,项羽“忍弃其关中之都,忍弃其敖仓之食,忍弃其智能之范增,忍弃其同起事之子弟八千人,而且忍弃其倡义首事之季父梁,则亦孰不可弃也?而独不忍弃其美人与所骑之马,写尽妇人之仁矣”(“史记”卷一7)。可见,王又朴不仅善于发现事件之间的微妙联系,

而且注重在这种相互关联中确定每个事件的意义,从而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

又如《淮阴侯列传》的论赞写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司马迁3169)。这段话,如果读者仅仅拘泥于字句,那就难免辜负作者的一腔苦心。从字面上看,司马迁表达了对韩信的批评,称他背叛朝廷,所以被夷灭宗族是其罪有应得;实则此乃反言见意的笔法。司马迁为韩信功高盖世、却被无辜杀害的遭遇,感到深深的不平,对高祖、吕后的刻薄寡恩、阴险毒辣感到极端的愤慨;但在汉王朝残暴的统治之下,他无法正言直叙,所以只能采取自掩笔墨的方式,假意在论赞中批评韩信反叛朝廷是罪有应得。这一点,虽然冯班、汤谐、方苞等人早已指出过,^②但王又朴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细节作了更加细腻的剖析,提出了更加有力的证据,论述得更加详尽。比如他说:

前叙信寄食南昌亭长、漂母饭信及受辱于少年诸琐事,后叙信之相报,一一详写,不少遗者,正为信不反汉作证。见信一饭尚报,况遇我厚之汉王乎?以少年之辱己,尚不报其怨,又岂以汉王之厚己,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史记”卷二33-34)

也就是说,韩信对漂母的一饭之恩尚且终生牢记,并最终予以厚报,他怎么可能忘记刘邦的知遇之恩呢?那个曾使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少年屠夫,韩信做了楚王,不仅没有杀他,相反却任命他为自己手下的军官。胯下之辱,对于一位军人来说,可谓奇耻大辱,然而韩信尚且以德报怨,以如此宽厚的胸怀,他怎么可能反叛刘邦呢?按照一般的解读模式来看,《史记》中的琐事和细节,乃是颊上添毫之笔,目的是为了刻画历史人物的鲜明性格,将人物写活。这种解释显然过于宽泛。而在王又朴看来,这两个细节的描写,主要还是为了暗示韩信根本不可能反叛刘邦,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在论赞部分对韩信的批判,只不过是反言掩饰内心的难言之隐罢了。^③这是方苞等人都不曾提到的新观点,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以往人们大多认为

细节只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在王又朴看来,细节的剪裁和搭配,主要还是为了说明或暗示全篇文章的大义。很明显,这正是义法说在批评上的具体体现。

《史记》中很多看似互不相关的字句和细节,经王又朴揭示,顿时呈现出血脉一样的联系。比如他在《项羽本纪读法》中说“以‘大惊’字,收前无数‘大怒’字;以‘皆泣’字,收前无数‘皆慑伏’等字;以‘莫能仰视’字,收前无数‘莫敢起’等字;后一‘笑’字,乃‘大怒’字余影‘皆伏’字,乃‘皆慑伏’字余波”(“史记”卷一28)。王又朴之所以能敏锐地揭示文法背后的深意,发前人所未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往往将一篇文章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把文法置于整体的脉络之中进行观照;也就是说,他对文法的把握,都是以理解整体的大义和脉络为前提的。当然,他对文法的敏锐把握,反过来又印证和加深了他对整体的理解。这一批评视角,也体现了义决定法、法随义生的古文观念。

王又朴以古文批评的方式,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义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深了人们对古文学法理论的认识,为桐城古文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王又朴对金圣叹小说批评方法的借鉴

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既新颖深刻,又细致入微,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他发扬了方苞的批评思想和批评方法,但同时也缘于他有意识地借鉴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眼光和经验。

在大多数古文作家的观念里,小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因此小说批评也就自然为古文家们所轻视,就连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难逃正统文人的非议。而王又朴则并不拘泥于这一偏见,相反,他对金圣叹的《水浒》评点相当推崇。据王又朴自己回忆,他曾反复研读过金批《水浒》,之后古文水平大大提升,以至令此前对其文颇不以为然的友人孙嘉俸刮目相看(“介山”9)。不仅如此,王又朴还有意识地借鉴金圣叹小说批评的方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古文批评之中。他在《史记七篇读法》的后序中,曾坦白承认这一点:

或又曰“子之尊信史公固已,然所为读法者,例取之金圣叹氏,以其说稗官野乘者,而以读正史,毋乃猥甚,将所尊信者何如欤?”余曰“千古细心善读书人,固未有如金氏者也。且世儒为前说所锢蔽已久,非详为说之,不能破其愚而解其惑,故特用其例。”(后序2)

王又朴称金圣叹为历史上最细心、最善读书之人,其倾倒之意溢于言表。这表明他的批评思想并未受到传统偏见的禁锢,相反却显得十分灵活。

王又朴所受金圣叹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借鉴金圣叹总结《水浒》文法的眼光,对《项羽本纪》的文法进行了精彩的揭示和提炼。比如他提出的“大关锁法”、“段段关锁法”、“大落墨法”、“零星点次法”、“埋伏法”、“照应法”、“明写”、“暗写”、“极详”、“极略”、“上下相形”、“急脉缓受”、“缓脉急递”、“于语言中夹叙事”、“于叙事中间又夹叙别事”、“文字互救”,等等,与金圣叹总结《水浒》文法而提出的“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弄引法”、“极不省法”、“极省法”等,在分析的视角上,显然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王又朴并非生搬硬套他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术语,而是在其启发之下,根据《史记》文法的实际,提出了很多富于创造性的概念和见解。比如他在论证《项羽本纪》“有暗写处”时说“如受郿降,为急于入关也,却一字不露,止于‘与军吏谋’一语,及下接连写‘两大怒’字见之。又如羽失诸项及楚人之心,亦一字不露,止于项伯之为汉间、项庄之不尽力于羽,及‘闻楚歌’数语见之;然写项庄之不尽力,亦不明写,却于范增口中‘竖子’句点出;而写项伯,却先写其与张良有旧,来与俱去,若全不为汉王者,此则史公自掩其笔墨之迹也。又如写羽之失人心,至无一人乐为用,全不明写,止写其亲身挑战及其军两呼‘万岁’,反面见出”(“史记”卷一32)。又如他在论“缓脉急递法”时举例道“如叙范增以疑问去楚,笔意甚闲,却急接纪信诳楚;叙项王闻歌起饮,一‘歌’,一‘和’,一‘泣’,众泣,几如哀弦繁怨,再不得了,却陡接‘于是项王乃上马骑’等是也”(“史记”卷一33)。这些见解都深入揭示了文本内在的牵丝映带关系。而王又朴之所以能敏锐地把握文本结构中隐秘微妙的关系,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他与金圣叹一样,也是一位写作八股文的高手;长期严格的八股文写作训练,培养了他对文本结构的极其敏锐的把握能力和分析能力。

王又朴受金圣叹影响的另一表现,就是他非常善于揣摩所评书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作者隐含在笔墨之中的幽微心理,并能以合情合理、体贴入微的推论将其还原和呈示。

金圣叹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是他十分善于发挥联想和想象,根据人情物理的一般规律,对书中的意义空白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感悟。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同样如此。比如《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朱熹 367)。对于这段话,王又朴在《孟子读法》中评论道“此章在七篇中为第一风神绝世文字。若质言之,不过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可谓百世之师矣。顾乃不先点夷、惠,而但空叹圣人为百世之师,然后以夷、惠实之,望古遥集,此其情致为何如?既又因其是圣人而叹后世之人莫不闻风兴起,推服景从,其情致又为何如?既有因闻风兴起,而叹其为圣人,自思自问,自问自答,其情致又为何如?既又因后世之闻风兴起者,而思及当日亲见之人,不徒仰慕夷、惠,而并仰慕及夷、惠之徒,如绘天神者,并其前后侍从,皆有道德庄严之气;绘虎豹者,并其经过草木,皆作劲色。一时若妒、若羨、若恨、若叹,其情致又为何如?然后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生于情者,情深则文自深矣。孟子虽不学夷、惠,而于其高情胜概,犹心慕手追,至于低徊流连,往复再三而不能自己如此,又见天下未有不深于情而能为圣贤豪杰者也”(“孟子”卷十四 4)。这段话有如剥茧抽丝一样,对孟子的思想和心理进行了层层深入的揭示。显然,王又朴对《孟子》的分析,并非只是简单地概括思想和揭示风格,而是尽可能地还原文章营造的情境,推测和想象作者及书中人物的细微心理及其变化轨迹,从而将《孟子》文章蕴涵的丰富的文学性呈现了出来。《孟子》原书在写作上采用的主要是对话体,对话的背景和对话者的心理都没有作详细的交代,所以文中存在很大的意义空白。而王又朴通过合理的想象和还原,使《孟子》的文章不再是一次次简单枯燥的对

话或独白,而是一幕幕生动活泼、令人过目难忘的情景。

又如《史记》所载项羽接受章邯投降一事,很容易被视作项羽入关途中很平常的一件事。而在王又朴看来,“羽之所以大失人心处,则在于受章邯之降之一事也。何也?项氏世世为楚将,而楚为秦所灭,则秦者,羽之国仇也;羽之大父为秦将王翦所戮,则秦又羽之家仇也;梁为羽之季父,而首起事,及兵败身死于邯手,则秦将章邯又羽之切仇也。且楚人实嫉秦而怜怀王之不返也,梁为楚复仇于秦,而立怀王后,则梁为楚人所爱慕可知矣。楚人既甚爱慕乎梁,则必甚仇怨乎杀梁之章邯。乃羽以急入关之故,而受邯降,是忘仇也,是弃亲也,是薄于所首事之季父也。夫薄于所首事,则凡一时共事者,无不可薄也;薄于首事之季父,则凡共事与不共事之伯仲叔季,更无不可薄也。此固诸项之不言而寒心者矣。故羽之不仁,秦人怨之,天下怨之,即楚之人亦怨之,即羽之诸父昆弟亦莫不怨之”(“史记”卷一 5-6)。这也表明,王又朴善于根据人情物理的逻辑,对史事及人物的心理进行合情合理的联想与推断,从而使隐含的文意得以清晰明白地呈现出来。

在文本细读的方法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新批评与王又朴的义法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新批评只关注作品本身的技巧,无视作者的意图,而王又朴不仅重视文本本身,而且兼顾作者的意图,显然更加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因此也就能收到更加全面的批评效果。不过,在推测作者的创作意图时,王又朴也像金圣叹一样,有时也会过于依靠个人的感悟,刻意创新,以致反失作者之本意。比如在《李将军列传读法》中,王又朴认为李广坑杀降兵是背道之举,是其终生未能封侯的原因,司马迁深感可惜,故而作此传以明之。实际上,景帝、武帝一味宠信和重用亲戚,对李广则一再排挤和压抑,这才是导致李广一生悲剧的真正原因;从全传淋漓悲慨、催人泪下的叙述来看,司马迁对李广是极为同情的。王又朴认为司马迁作此传是为了表达他对李广坑杀降兵的批评,显然没有把握到作者的本意。当然,这种失误在王又朴的古文批评中并不多见。

王又朴受金圣叹影响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他的古文批评注重情感体验,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一样充满激情,富有鲜明的个性和文学色彩。

《史记》中关于垓下之战的一段,写得极其慷慨悲壮,而王又朴的评论也尤其酣畅淋漓。“于风戈铁马、战苦云深之际,写歌,写饮,写诗,写和,写骏马,写美人,抑何风流婉丽也;然婉丽之中,纯是一片凄切,凄切之中,又觉甚是悲壮:此真化工之笔,吾恶得而测之哉”(“史记”卷一26)。“未写项王歌,先写楚歌,又写美人和歌,又写项王泣,又写左右皆泣,一片儿女深情,笔势几于不振;此下忽然换调,银瓶乍破,铁骑突出,而以‘于是乃上马骑’、‘乃觉之’二语过下,笔势真如兔起鹘落”(“史记”卷一27)。透过这些饱含深情的语言,可以看出,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既注重理性分析,又兼顾情感体验。他擅于想象和还原文本营造的情境,并能设身处地,与作者或书中人物感同身受,所以他的批评文字具有浓厚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文学性。这一点,除了金圣叹的影响之外,当然也与他本人就是一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古文家有关。

作为桐城派的成员,王又朴借鉴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方法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古文与小说在叙事上本有相通之处,金圣叹就曾把《水浒传》和《史记》相提并论,甚至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施耐庵卷首10);既然如此,那么金圣叹评《水浒》的方法当然可以作为评论《史记》的借鉴了。另一方面,在于桐城派古文理论与金圣叹的批评理论也有相近之处。方苞说过,为文必须“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方苞”卷六164)。所谓“依于事物之理”,就是说为文要遵循人情物理的性质、逻辑和规律。这与金圣叹的“格物”说是比较接近的。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之所以能写出众多好汉的不同性格,“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施耐庵卷首5)。这里所说的“格物”,即是指对人情物理的深切洞察。不论是桐城派主张为文要“依于事物之理”,还是金圣叹的“格物”说,运用到文学批评上,自然都会注重根据人情物理作合理的推想;而这又正是金圣叹格外擅长的方法,王又朴加以吸收和发挥,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方苞认为古文必须具有雅洁的语言和质而不芜的文体特征,因此反对古文杂用小说语言。可见在方苞看来,古文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能混淆。而王又朴却自觉

借鉴金圣叹的小说批评理论来分析和总结古文学法,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他对方苞义法说的一大突破。不过,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始终是以方苞的义法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他对金圣叹文学批评方法的借鉴,并未改变其由法见义、因义观法的根本原则,因为他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金圣叹文学批评方法中与桐城派古文观念相吻合的部分,并将其融入到桐城派古文批评理论体系之中,其理论立场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

四、王又朴古文批评的价值

王又朴曾自称“读《史记》三十年”,方才明白《项羽本纪》的真正意旨(“史记”卷一4)。不仅如此,《史记七篇读法》一书其实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其中《项羽本纪读法》成于乾隆二年,其他六篇则是乾隆十九年才最后完成的(“史记”卷首1、3)。可见,他精读《史记》几乎持续了半辈子,长期的揣摩使他具备了深厚的细读功力。从总体上看,王又朴是一位注重实践的古文批评家。他虽然没有像方苞、刘大槐、姚鼐等人那样提出独创性的古文理论,但他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非凡的判断力以及富于鲜明文学性的批评语言,在古文批评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首先,王又朴借助于细腻的文法分析,揭示了《孟子》和《史记》的很多义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此二书的理解。一般治经史的学者,大多不太关注经史著作的文法。然而实际上,在一些优秀的著作中,文法和义理往往是融为一体的,文法本身即蕴含着义理,而特定的义理往往是通过特定的文法表现出来的。如果忽视文法,势必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史记·儒林列传》,王鸣盛称它“力表武帝能尊儒”(卷六36),孙德谦也认为“此传力表武帝之尊儒,语多颂扬”(卷上64)。实际上,司马迁在此传中巧妙运用了反言见意、明褒暗贬的笔法。王、孙二人未明此点,相反却被其歌功颂德的门面话所迷惑,所以得出了与作者真实意旨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又朴在其古文批评中,采取由文法以观义理的途径,注重把握文法本身蕴含的深意,因此也就得出了很多一般经史学者没有提出的新见解。日本著名学者竹添光鸿手录的《孟子论文》一书,曾大量辑录《孟子读法》中

的观点,王又朴古文批评在经学史上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王又朴以其批评实践证明,由文法入手以揭示义理,是经典阐释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是他和桐城派其他古文批评家的长处。钱大昕等经史学者无视这点,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王又朴在继承方苞古文思想的基础上,以文学批评的方式,直观地呈现了“义法”的理论内涵和丰富外延。义法说是“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关爱和 66)。在方苞看来,为文须讲义法,是古文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然而“义法”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文法体现出来的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方苞通过选评《左传》、《史记》之文,以例证的方式说明了义法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王又朴在继承方苞古文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其师未竟的批评事业,总结了很多古文创作的规律和技巧,提炼了很多既形象又富于概括力的概念和范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古文义法的理解。比如古文节奏是桐城作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而王又朴通过分析《项羽本纪》急脉缓受、缓脉急递的笔法,展示了节奏变化的两个具体表现形式,深化了人们对古文节奏的认识。当前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文本细读的缺乏,而细读的缺乏又缘于话语的贫乏和方法的欠缺。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方法,对于当代学者的古文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而他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则为今人在古文细读方面提供了一些具体门径和言说工具。

再次,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对于当代学者的文学批评方式的改进,也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建构本土化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的呼声日益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改进当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 and 言说方式,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又朴的古文批评,不仅有敏锐的发现、准确的判断,而且还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文学色彩,尤为难得的是,它还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分析,不同于一般纯印象式批评。这在他的《史记七篇读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书采用的虽是文话和评点的形式,但其每篇“读法”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这个观点。这种兼具感性形式和理性分析的批评方式,对于当代学者避免文学批评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具有较高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而他使用的概念、范畴,及其总结

的创作规律,有些至今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如果经过现代阐释,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提供参考。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王又朴通过古文批评的方式,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古文义法的一些具体表现,有助于人们更直观深入地把握古文义法。但是,“义法”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的外延是无限丰富的。除了王又朴之外,桐城派其他古文批评家也在他们的古文批评之中贯穿和发展了义法说,总结了更为丰富的创作技巧。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桐城派,必须加强对整个桐城派古文批评的研究。而且,桐城派的古文批评,对于建构本土化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值得当代学者有选择性地学习和借鉴。

注释 [Notes]

- ① 迄今只有孙爱霞“论桐城派对天津文学的影响——以王又朴为例”,《社会科学战线》8(2010):273-75一文,对他的生平和古文创作进行了扼要的论述。
- ② 参见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38-40。
- ③ 参见余祖坤“论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反言’笔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2):68-75。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Fang, Bao. *Fang Bao'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方望溪遗集》徐天祥陈蕾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 *Fang Bao's Posthumous Works*. Eds. Xu Tianxiang and Chen Lei. Hefei: Huangshan Bookstore, 1990.]
- 关爱和“义法说: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文艺研究》6(2004):66-73。
[Guan, Aihe. “The Notion of Yifa (Meaning and Method):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Tongcheng School's Theory of the Ancient-Style Prose.”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6 (2004): 66-73.]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Guo, Shaoyu.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Ji , Yun , et al. *General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of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历代文话》第10册,王水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Liu , Shengmu. *A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Literary Source of Tongcheng School. Commentaries on Prose across the Dynasties*. Vol. 10. Ed. Wang Shuizh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施耐庵《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金圣叹评。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年。
- [Shi , Nai'an. *Water Margin Annotated by Jin Shengtan*. Annotated. Jin Shengtan. Nanjing: Phoenix Press , 2010.]
-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2013年。
- [Sima ,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四益宦刊本,1923年。
- [Sun , Deqian. *On "Yifa"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Edition Printed by Siyihuan ,1923.]
-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
- [Wang , Mingsheng. *Some Personal Understandings on The Seventeen History Book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王又朴《王介山古文》,《诗礼堂全集》。清刻本。
- [Wang , Youpu: *Ancient-Style Prose Works of Wang Jieshan. The Complete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 :《介山年谱》,《诗礼堂全集》。清刻本。
- [—: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Wang Jieshan. The Complete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 :《王介山时文》,《诗礼堂全集》。清刻本。
- [—: *Contemporary Essays of Wang Jieshan. The Complete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 :《史记七篇读法》,《诗礼堂全集》。清刻本。
- [—: *Reading Techniques of Seven Biographie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Complete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 :《诗礼堂杂纂》,《诗礼堂全集》。清刻本。
- [—: *Miscellaneous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The Complete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 :《孟子读法》,《诗礼堂全集》。清刻本。
- [—: *Methods to Read the Works of Mencius. The Complete Works from Poetry-Rite Hall*.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 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Zhu , Xi.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Works of Men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责任编辑:查正贤)